

鲁明◎著

電影新語

陈锡祥題



長沙出版社

电影新语

鲁明著

长征出版社

书 名：电影新语

作 者：鲁 明

封面题字：陈锡祥

责任编辑：李 晓

装帧设计：博轩嘉美

出版发行：长征出版社

社 址：北京阜外大街 34 号 邮编：100832

印 刷：北京京北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50×1168 1/32

字 数：242 千字

插 页：1

印 张：12.75

版 次：2008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08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 价：30.00 元

统一书号：7 80204·444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序一

波浪无穷，而光采有主

刘建中

鲁明老师邀我为他的新作写序，实不敢当。读文之后，备感亲切，欣然命笔。

上世纪60年代初，当我尚在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求学之时，鲁明就是同学们崇敬的院领导和老师。摄影是他的老本行，他却能讲授哲学课，而且十分精彩，从不照本宣科，把枯燥的哲学讲得鲜活、生动，极具吸引力。时隔几十年，同学们还有此议论。

我毕业后分配到北京科影厂，从事科教片创作近30年。“文革”后期鲁明也来到科影厂，他既是我的领导，又是同行。我清晰地记得他编导的文物考古系列科教片，受到中央领导和有关方面的好评。鲁明老师于1993年67岁时离休，离休后又做到了离而不休，不断在《电影艺术》等报刊发表文章，已结集出版了三本书，现在又要出这第四本书。他每出一本书都不忘送我，抽暇拜读了各书的重点文章，前几本书论述的中心题目是延安电影团和中国电影教育，这第四本书，似乎是对这两大题目进一步地综合。他的书的主要特色，是以一个亲历者、参与者、当事人向读者叙事。他1938年入伍，1944年调入延安电影团，

从此，毕生在电影圈内拼搏。经历了几个时代，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从延安电影团到兴山东影厂。建国后又经历了新影厂、电影学院和科影厂。他的时序推移如此漫长，使他亲密接触了许多关键人物，经历了无数历史时刻，他善于依实引据，透彻说理，从而在他笔下记叙的事，读来感到亲切、生动、可信。八十有二的鲁明老师仍然思路清晰，博闻强记，对他亲历的延安电影团、兴山东影厂等的纪事，确可丰富这段电影史，尤其是至今仍能笔耕不辍的亲历老人已凤毛麟角，就显得更为可贵。

鲁明老师的叙事行文也很有特色，一旦多读他的几篇文章，就会感到在纪事中，总在努力挖掘出一点东西，或是人们不易体察的感情，或是有点启迪意义的哲理，或是带有普遍性的原则，颇为受益。

至于书中通过记叙发为议论的延安电影团人员及举办两期摄影训练班学员名单，可能与别的书刊记载有所不同。新中国电影“摇篮在何处”，以及如何看待中国电影教育等问题，鲁明老师发表了他的见解，可与电影史学家们进行学术性讨论，以求共识。即使有不同意见，也无不可，真理总是愈辩愈明。

愿鲁明老师再有新作！

2008年2月18日

(刘建中，历任科影厂摄影、一级编导、副厂长、新影厂厂长，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局长、中国电影博物馆布展领导小组组长、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序二

一个老延安的电影情

张同道

一个晴和的春日午后，我再一次坐在鲁明老师布满阳光的小屋，书桌、书架和老式木床散发着久违的、80年代的亲切气息——这在争分夺秒奔奥运的现代化北京已然有些怀旧的意味。鲁明老师用他一贯洪亮的声音告诉我：“又要出一本书了，想请你为这本新作写个序。”说罢一笑，笑容坦荡，一如窗外的阳光。这是82岁的鲁明老师六年来的第四本书，内容依然是延安电影团、中国电影教育和关于电影的人与事。我的惶恐超出了惊奇：嗟乎小子，何敢赞一言！

鲁明老师是一个具有历史般厚重感的电影人：12岁奔赴延安成为小八路，19岁加入延安电影团，跟随电影大师吴印咸学习摄影，在红色根据地拍摄，在枪林弹雨里拍摄，晚期又把摄影机对准遥远的华夏文明之源——红山文化、马家窑文化、良渚文化、安阳殷墟……中间还在北京电影学院从事电影教育工作——他从事电影工作的时间整整50年。他的一些作品已然成为中国电影史的章节，像《红旗漫卷西风》、《第

一届全军八一运动会》等。1993年离休以后，读书、写作成为他的日常生活，而这四本著作则是晚年求索的成果。

一个握惯了摄影机的人为什么要拿起笔来，而且一连写出这么多文章？在娱乐统领传媒、学术举步艰难的今天，鲁明老师的写作和出版行为向挑战风车的唐·吉诃德骑士遥遥致意。这一行为的寓意也许就隐藏在这些文章的字句之间。

鲁明老师四本著作所谈论的中心话题一以贯之：延安电影团、中国电影教育以及与此相关的人和事。关于延安电影团，袁牧之、吴印咸、钱筱璋自然是反复书写的主人公，但他的笔并没有在这里止步，拍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摄影师苏河清、洗印《南泥湾》的洗印师周从初、接收“满洲映画”的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长凯丰等人也成为书里的重要内容，这些曾经立下功绩的人如今在电影史上默默无闻，鲁明用自己的笔打捞起一段失落的记忆。为了寻觅凯丰的一张照片，82岁高龄的鲁明骑着小三轮车满北京四处查找。非常奇怪的是，这位当年声名显赫的宣传部长似乎突然被历史抽空，消失得无影无踪。鲁明老师踏破铁鞋，最终才找到一张照片——还是合影。延安电影团的第一台摄影机到底是荷兰纪录电影大师伊文思赠送的还是有些人自己带到延安的？为此他不厌其烦地写了几篇文章，仅仅为了澄清历史的本来面目。鲁明自己说，“不论来自何方，也不论出于个人情感还是

怀有个人不可告人之目的；凡属人生之大事者，只要不符合历史事实，均尽我所知加以辩明。不为别的，只为给后人留下一页真实的历史。”

也许因为曾经在北京电影学院从事电影教育工作的缘故，鲁明老师对于中国电影教育情有独钟。中国电影高等教育创始人、金陵大学孙明经教授、新中国电影教育开拓者章泯先生、新时期电影教育家沈嵩生教授反复出现在鲁明笔下，特别是被历史烟尘湮没的孙明经和章泯。2004年9月3日，我制作的关于孙明经人生与电影的纪录片《世纪长镜头》在中央电视台播出，播出时间为凌晨一点。鲁明老师每天认真观看，看完就写感想，写完感想就到两点了，连续12天，一集不落。节目播出第二天我就飞往纽约，在纽约我看到《北京电影学报》发表的鲁明老师的长篇评论《种花留与后来人》，我的敬佩早已淹没了激动。

因为酷爱黄土地上农村婆姨剪的花花儿，我曾十次去延安采风或拍摄，也拜访了延安的革命圣地：宝塔山、清凉山、凤凰山、枣园、桥儿沟，企图感受那个时代特有的理想主义气息；因为从事纪录片工作，我也多次从延安电影团留下的那些无声影像里捕捉人们常常谈论的“延安精神”。然而，鲁明老师以他的行动直接告诉我什么是“延安精神”。

收集在本书里的文章如同前三本著作一样，“笔端常带感情”（梁启超语），凝聚着一位从业50年的老延安对电影的忠贞爱情：电影不仅烙下青春的印迹，

理想的光彩，也见证了生命的成长，岁月的沧桑。那些曾经记录了一个时代体温的电影终将把温暖传递给新的时代，那些曾经激动了无数青春面孔的电影也将给持摄影机的电影人永远年轻的心灵，祝福鲁明老师：仁者长寿，智者常乐！

2008年3月30日于北京

(张同道，北师大艺术与传媒学院影视系博士生导师、教授)

自序

我的前三本书，都是以杜甫诗句“天时人事日相催”来表达出书的缘由和心情。这第四本书，我却要用成语“树欲静而风不止”来表达了。

这风，虽然不是十二级台风或龙卷风，不过，却也是蛮厉害的逆风，吹得人很不舒服。比如，我在前三本书一再讲，延安电影团唯一生产的一部完整影片《南泥湾》，就洗印来说，简直就是电影技术史上的奇迹。在没有任何洗印设备、何况在延安当时也没有电的情况下，由洗印专家周从初创造奇迹，把16毫米正片（当负片拍的）洗印出来了。这是何等珍贵的延安精神，可是居然还有人言之凿凿地说延安电影团“购得了包括摄影机、洗印机、放映机等全套16毫米电影器材……”^①

这一想当然的臆说，把电影团的延安精神一风吹得无影无踪。

再如，署名小雨发表在1998年第11期《中国电影报》访谈录，这篇访谈录把延安电影团做的那点事，一股脑地移栽到抗敌电影社名下。见报后，我立即据以事实回敬了这篇不实之辞。^②可是，至今换个说法仍

死抱着未拍过一尺胶片也未拍过一幅照片的抗敌电影社不放，至少要把它与电影团并列，或枉说延安电影团来之于抗敌电影社的还大有人在。

再如，延安电影团的全部家当，除吴印咸自带到延安几台照相机外，就是两台轻便型手提摄影机，一台为35毫米艾姆是国际友人伊文思赠送的，另一台为16毫米飞力浦是袁牧之赴香港自购的。这已是电影圈人人皆知的事。可是，依然有人还要以假乱真。前些日子，伊文思遗孀委托好友来京了解伊文思赠送的这台摄影机的下落。千方百计打听到我，我告诉她，这台摄影机现在正陈列在中国电影博物馆。我还对她说，这台摄影机对中国人民电影事业早期的发展起了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正如电影团训练班学员们称它是中国抗日战争两大功臣之一，另一功臣则是16毫米飞力浦摄影机。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得到的第一台35毫米电影摄影机并真正发挥了作用，唯有伊文思赠送的这一台。此外，一切偷梁换柱的说法都是徒劳的。最后，我向她推荐了吴印咸的《影艺六十年》，吴是接受伊文思赠送摄影机唯一现场当事人，看他生前的亲笔文章，就把握了此事真相最权威的说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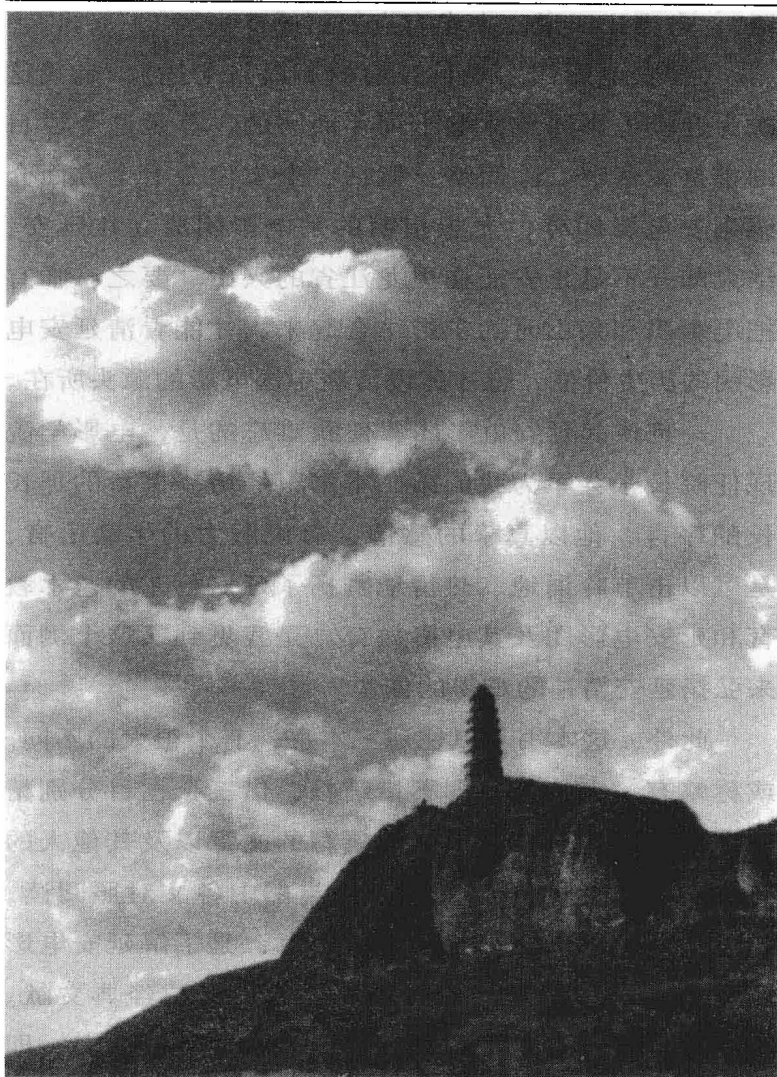
如此这般的风不止，树何能静。于是下决心，改变不想再出书的固见。虽仍蜗居一室并进入高龄，也要重新奋起，战胜这样那样的困难，再出版一本书。书名故且定为《电影新语》，或许能衔接也以电影团和电影教育为主要内容的上一本《电影史记》。既称“新

语”，自当比旧说，力求有点新鲜感。

“延安电影团”栏目开篇的那篇《七述》，是我这次为迎接电影团成立七十周年而写的，算是这个栏目的主打文章吧。除简略、概括、全方位分七个方面介绍延安电影团外，尤想指明的是电影团成立在延安，结束却并不是延安而在黑龙江省的兴山。要之，唯有把电影团和兴山时的东影结合起来，才能看清延安电影团的历史价值，也才能说清新中国电影的源头所在。

一旦谈起延安电影团，使我难忘的是，电影学院现任院长张会军为我的第二本书《经历》撰写的那长长的序言，他以真挚的感情、有说服力的生动语言，是可以击节吟诵地、热情地赞扬了延安鲁艺的艺术教育和延安电影团及其电影教育。是我见到从这个侧面来弘扬延安精神的难得的佳作。

此外，这本书与以往那三本书，有个很大的不同。或称略有一点特色，即不惜篇幅，借三个栏目分别精选书中涉及重要当事人生前撰写的文章以及其他人的有关文章作为附录。读者一旦与书中各文对照阅读，或可立即判断事实真相。这些文章，是了解延安电影团和中国电影教育的珍贵资料，有的已成经典文献。其中不少当时发表在内部刊物，且不说一般读者，即便是专业研究者，也难于找到这些文章。如此说来，岂不是做了一件大好事，敢斗胆称为“至公”吧。不过，从各栏目附录的诸文这件事本身来看，本书应是合著，因为这里面凝结了大家的心血和劳作。



◎ 吴印咸把他 1938 年夏与挚友袁牧之一起奔赴延安称为“人生的转折”。

这是“转折”后第一幅摄影作品——延安。吴印咸凭他那锐利的摄影目光，一下抓到了延安的血液和脊梁。



西方一位美学家(莱辛)说,造型艺术的最高法律和最高目的是物体的美……李大钊说,何为美?美的母体谓和谐。他称之“调和”。以此观之,以吴印咸作品为代表的延安电影团摄影作品,其美学含量便可凸显。拿风光照片说,吴印咸等人把延安这座历史要塞名城和今日革命圣地结合得多好,把三山(凤凰山、清凉山、宝塔山)对峙和二水(延河、南川河)交流又表现得多么美。还有这幅《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抬棺,送张浩最后一程》,把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和人性之美完美地融为一体,使人们通过悲痛升华为美感。吴印咸毕生摄影艺术的最高追求正在这里。

“中国电影教育”栏目，是本书另一重点。谈起电影教育，首先使我想到我很熟悉的一个名字——沈嵩生，是他在恢复、重建电影学院第二任院长、第一任高校影视学会会长，他以这双重身份，多次举办暑期高校教师影视研讨会。其中一次，事先邀请我讲一个题：《解放区的电影教育》，当我临场宣讲时，始知他还安排了两个题，一是孙建秋（孙明经的二女）讲金陵大学电影教育，二是他本人谈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电影公司举办的以培养演员为主的电影教育。

此举，真是“体大而虑周”，对我启发极大。

自此，我心目中的电影教育，是指中国自有电影之后的全国电影教育，包括解放区、国民党统治区，以及新中国的电影教育。本书这个栏目收的关于章泯、孙明经、沈嵩生、廖家祥等五篇文章，和前几本书的有关文章无论是写作心境还是叙述思路，均一脉相通。终其目的，无非是想为中国电影教育史树立几个座标，供电影教育史家们著书立说参考。标立直了，影就不会歪斜。坚信，为写好中国电影教育史，他们不能不参考我的书。

本栏附录孙明经的这篇文章，文虽短价甚高。过去，我们追溯电影学院建院史，只追溯到陈波儿主办的表演艺术研究所。只能把电影学院说成来自于北京西城区石老娘胡同，难免目光太短浅。看看孙明经的这篇文章，会把我们的目光，延伸到应有的深处。

张同道、黎煜夫妇，是近年来研究孙明经在电影

教育方面贡献的先行者。我在《电影史记》引言里说的：“对建国前电影教育的探索，是由一位年轻学者敢为天下先，我不过紧随其后而已”。这位年轻学者，就是指的张同道夫妇。他们的研究可谓硕果累累，已公开发表四五篇专文，这里仅附录其中的一篇。

本栏目附其他人文章无须一一介绍了，腾下篇幅谈谈附录章泯的这篇文章。章泯是新中国电影教育主要代表人物，文革前他全面主持学院教学长达12年之久，文革中及文革后，他虽然离开领导岗位，但他的教学思想对学院影响不能低估。公认，他既具有学识魅力又具有人格魅力。以他为这一时期的座标，必是众望所归。他的这篇文章是他早期作品，发表于1937年初国统区受我党影响的进步期刊。虽不是专谈电影教育，然而，它的理论高度，其“精神命脉和骨髓”都能与电影教育紧紧联系起来。

例如文中有这样一段：“创造的艺术家的，要是对于整个的社会、现实生活，及他的艺术本身没有深刻而广博认识的话，他是难以获得那表现的‘泉源’的，因为这表现的‘泉源’是蕴藏在社会中、现实生活中的。他要是不从这里面汲取，他就会陷进死水潭里，他那表现的生活就成为一种死沉、呆板、无活力的污浊的‘死水’；而不是活跃、生动、美妙清澈的‘泉水’。‘泉水’是人人喜爱的，‘死水’是人人厌恶的。前者是活的东西，后者是死的东西”。

这一段，实际上讲了包括表演艺术，乃至整个文

学艺术源与流的关系，论述得正确、得体。我们不妨对照毛泽东 1942 年 5 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那段经典论述：

“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一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拙，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实际上，过去的艺术作品不是源而是流……”

我看，任何其他赞美文字，也不会超过引证这一历史对照所显示的力度了。这就是我国古典文论所说的：“真精神与千古不可磨灭之见”。

文中其他论述，有的也很光彩，甚至精辟。短短文字，使人感到它的学术价值不凡；它还涉及了文艺圈中的重大问题，如社会责任、道德意识等，至今读来仍令人神往；甚感文章无古今啊。

他不仅有理论建树，其创作也很丰盛，特别是剧作，很能显其壮志。例如他的《故乡》就是早期抗日烽火“九一八”戏剧的经典制作。若把他的这些成果一一列出，将是一份颇费笔墨的长长的清单。

遗憾的是，曾轰动一时，他执导的那些中外名剧，那时没有录像，无法留下其时演出的舞台效果。只能